

土生葡人富商非難地伯爵與澳門華商

黃文輝 *

摘要 土生葡人富商非難地伯爵是十九世紀澳門社會、政治和經濟領域極具影響力的人物。他從1857年與華商共同成立“市集守護隊”起，便逐漸與華人建立密切的關係。隨着澳門開放闡姓、番攤等博彩項目專營，非難地為承投的華商出任擔保人，雙方之間更成為利益共同體。1871年，澳門華商籌款集資建立鏡湖醫院，由非難地創辦的公司“三記行”被列於倡建值事名單首位，開創土生葡人參與華人社團事務之先河。1893年，非難地獲葡萄牙王室封為伯爵，省港澳共85名華人商紳聯名向其贈送精美賀幛，其中包括當時剛到澳門行醫的孫中山。其祝頌詞更透露非難地竭力斡旋1892年澳門“料半酒大罷市”事件，使澳葡當局避過一場管治危機，亦使華商對非難地的仗義疏財感恩戴德；即使在非難地身故之後，華商仍集資鑄造銅像來紀念他。

關鍵詞 三記行；非難地；孫中山；華商；盧九

非難地全名為美拿年奴·先拿·非難地（Bernardino de Senna Fernandes），¹是十九世紀澳門社會、政治和經濟領域都極具影響力的土生葡人。由其經營的“三記行”位列1871年鏡湖醫院〈倡建值事芳名〉碑記之首，這是首度有土生葡人參與澳門華人團體，為澳門華人社團與澳葡當局“合作”鋪墊基礎。²過往學界對非難地與華商的關係未有深入探討，筆者日前翻閱澳門博物館出版的《三城記：明清時期的粵港澳灣區與絲綢外銷》（以下簡稱《三城記》）圖冊，³當中有1893年澳門華商集體聯名送贈非難地的兩套大型賀幛，孫中山亦名列其中，可見非難地與華商交誼匪淺。此兩套賀幛係新見文物，故草此文略作鉤沉。

一、受爭議的土生富商：非難地伯爵

非難地1815年在澳門出生，是該家族在澳的第三代。其祖父可能是華人進教者，從而成為土生葡人，故從傳世照片可見非難地的相貌

有明顯的東方特徵；且其家族成員有多位娶了華人妻子，包括非難地自己的第二任妻子（其家族同樣是華人進教者而成為土生葡人）。⁴因此，筆者相信非難地能操粵語，與華商溝通無礙。

非難地的早年生活經歷不詳。1846年，澳督亞馬留（João Maria Ferreira do Amaral）成立了一支臨時性民兵隊伍“澳門省營”（Batalhão Provincial de Macau），⁵非難地於翌年出任該營第一連上士。亞馬留成立這個“澳門省營”有特別用意，據土生葡人研究學者阿馬羅（Ana Maria Amaro）解釋：

這位總督〔亞馬留〕執政期間，除如何幫助武裝部隊保護好澳門居民的生命財產這個問題時常令他絞盡腦汁外，使他揪心的另一個問題就是如何安置本地那些浪蕩公子、無業人員或遊手好閒人士，這類人當時數量很大，其中不少或者靠幹點小活兒得點小收入維生，或者靠不大正當的手段弄點錢餬口。結果他想出了這一解決辦法。⁶

* 黃文輝，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歷史學博士候選人。

1857年，市集區（即草堆街、營地街、石閘門等三街為主的商業區）的華、葡商人為保護自身利益，自資成立類似保安隊性質的“市集守護隊”；為免守護隊不受控制，澳葡當局隨即進行干預，於同年9月29日刊出法令對其活動予以規範，但保留由市集區商人出資的做法。隨後，非難地及華商歐陽炳（Aion-Pom）和王阿超（Vom Achao）被澳督任命為守護隊籌募經費，並由非難地負責指揮。⁷據說非難地特意替守護隊從英國訂購武器，並因此於1861年被葡萄牙政府授予榮譽少校軍銜。此後，非難地在澳門社會扶搖直上，連續多年成為納公鈔最多的40個人之一，並先後出任救火專員、中國移民總監、仁慈堂值理等職務，兼任暹羅（1863年）和意大利（1886年）駐澳領事；又於1871年發起成立澳門土生葡人教育促進會。非難地亦獲得多個榮譽，包括獲頒基督勳章（1865年）、暹羅白象勳章（1867年），獲封“劍與塔榮譽騎士”（1869年）、“王室貴族騎士”（fidalgo-cavaleiro da Casa Real）及“才華、博愛及高尚銀質獎章”（1871年）等。當然，其人生榮譽的頂峰是獲葡萄牙王室授予爵位，分別是塞納－費爾南德斯男爵（Barão de Senna Fernandes，1888年10月25日）、⁸塞納－費爾南德斯子爵（Visconde de Senna Fernandes，1890年4月19日），⁹以及塞納－費爾南德斯伯爵（Conde de Senna Fernandes，1893年3月16日）。¹⁰可惜就在非難地最風光得意之時，他在加封伯爵不久後的1893年5月2日早上8時在家中去世。¹¹

在十九世紀下半葉的澳門，非難地不論在社會、經濟以至政治上，均是舉足輕重的人物，被稱為“當時澳門最有影響力的市民之一”。所謂譽之所至，謗亦隨之，非難地在世時便是個受爭議人物，他曾在1869年印發一本只有24頁的小冊子《向公正市民呼籲》（*Um Apelo ao Publico Imparcial*），歷數自己為澳門做過的服務，替自己辯護。不過，他的受爭議即使在身後依然不斷。據說澳門史學大家文德泉蒙席（Monsignor Manuel Teixeira）曾看過與非難地同時代的一位葡



圖1. 列有非難地所獲榮譽的賀幛（圖片來源：澳門博物館藏）

萄牙駐澳部隊上校的手稿，內文“將他的巨額財富和異常的奢華與海盜行為聯繫起來”，文德泉因此沒有將非難地列入其著作的《十九世紀澳門名人譜》（*Galeria de Macaenses Ilustres do Século XIX*）。¹²

二、尤愛華人：非難地與華商

澳門鏡湖醫院由一班華商在1871年創辦，但是在該院〈倡建值事芳名〉碑記排首位的，

學術筆記



圖 2. 1893 年華商祝賀非難地榮升伯爵的頌詞賀幛（圖片來源：澳門博物館藏）



圖 3. 祝賀非難地榮升伯爵的 85 名華商名單賀幛，“孫逸僊（仙）”名字在第四列左二（圖片來源：澳門博物館藏）

卻是非難地經營的公司“三記行”，¹³可見非難地與華商關係匪淺，隱然有華商首領之勢。

非難地與華商早有淵源，這可從前述 1857 年其與市集區華人商戶合組“市集守護隊”管窺。目前有檔案可查的闍姓專營開投始於 1869 年，由何老桂（Olo-Quai）及亞彭（Apom）投得，其擔保人便是非難地。¹⁴其後，非難地亦連續多年為尤勉之、何連勝、何老桂、馮成、何連旺、盧九、胡袞臣等番攤承充商人出任擔保人，直至其病逝。¹⁵事實上，非難地受到華商的一致擁戴，有兩件事可作佐證。

1893 年 3 月非難地獲葡萄牙王室加封伯爵時，省港澳有 85 名華商聯合向其致送了兩套大

型絲繡賀幛。第一套賀幛把非難地所獲的榮銜及其頒授日期一一列出（圖 1）；¹⁶第二套共三幅，其中一幅是祝賀頌詞（圖 2），另有一幅是致賀華商名單（圖 3）。¹⁷其祝賀頌詞如下：

昔孟子嘗謂“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之。斯三者，人所難具，今於大西洋欽賜伯爵美那年老·先拿·飛蘭地仁翁大人見之。溯其籍隸西洋，生長蠓鏡，功勳卓著，智勇深沈〔沉〕，匪僅見知於本國，亦且見重於隣邦。初舉遊戎，繼升領事，旋蒙欽加御前大臣銜，誥授男爵，晉授子爵，疊授伯爵，其邀主眷之深，良有以也。觀於去歲，闔澳滋事，



圖4. 現置於東方基金會會址的非難地伯爵銅像（圖片來源：筆者攝製提供）

曾蒙竭力解散，轉危為安，商民戴德。且素行善舉，至老不懈，七十餘年如一日，即古之大富貴亦壽考無多讓焉。茲者闔澳眾紳弗忘大德，敬以數語為頌。

頌詞稱讚非難地“功勳卓著”，此係祝頌常語，理所應當；但以“智勇深沉”頌之，當是與後文的“去歲”之事有關（詳見下文）。最重要的是，上述華商的頌詞並非虛情假意，他們的確是對非難地“弗忘大德”。因為非難地獲封伯爵不久後去世，澳門華商為紀念他，不惜重金從英國訂造非難地銅像（圖4）。1893年11月，新加坡《叻報》稱：

昨接澳門來信云，三記洋行西人花南第士，巨商也，富冠鏡濠〔按：原文如此〕、爵列五等。前數月因病溘逝，聞者惜之。花君生平與人相交，謙恭處己，

和易近人，故其死後，澳中華人想念遺風者，咸欲鑄金事之。現議集貲〔鑄〕造銅像，在鏡江〔按：原文如此〕擇地安設，以寄思慕而垂久遠。聞其銅像將在英國定造云。¹⁸

銅像底座正面有葡文碑文列出非難地所獲的榮譽，背面則為中文紀念碑（圖5），其銘文云：

絲繡平原，¹⁹ 扇畫放翁。²⁰ 蓋德澤入人之深而人乃繡之、畫之，以誌不忘也。西洋伯爵美那年奴·先那·非難地士，性慷慨，重義氣，尤愛華人，所求必應，為謀必忠。凡華人之旅遊而貿易於澳門者，無不得所庇蔭。今其人往矣而遺澤猶留，思慕之深，無所寄托。爰仿越人鑄范之義，特萃精銅鑄成斯像，庶音容宛在，如覩生平；儀範常存，時伸愛慕，不僅為山榛隰苓之寄慨云爾。

光緒 年 月 日²¹

陳厚賢、²² 盧焯之、何連旺等敬鑄并題

碑文以“性慷慨，重義氣”“所求必應，為謀必忠”來讚揚非難地，塑造出一個俠義的英雄形象；又說其“尤愛華人”，可見非難地與華商相知相交之深。澳門當然有許多土生商人，但得華商如此隆重紀念且交口稱讚的，首推非難地。

三、智勇深沉：非難地與料半酒事件

澳門華商高度讚揚非難地對華人的貢獻，固然有因長期相互之間利益共存而積累下來的交情，亦有非難地個人性格因素在內。最讓盧九（盧焯之）、何連旺等華商念茲在茲，即使在非難地身故後仍費詞揄揚的，應該就是上述祝賀頌詞中提到的“去歲闔澳滋事”事件，即澳門史上著名的“料半酒事件”。此事受矚目程度之高，連當年拱北關的年報亦作了詳細記錄：

學術筆記

1892年春，澳門官府為執行里斯本要求增加歲入的命令，經葡國政府准許，對一種稱為“料半”的商品實行包稅。料半是一種廉價的米酒，多為工人及窮人飲食。有個香港華人繳費七千八百元，承包料半稅之後，按官府規定的條件，從5月1日起每斤徵稅約五分錢，致使酒價平均增加百分之十六。此舉引起普遍不滿，議論紛紛，盛傳從此之後，所有生活必需品均需一一徵稅。華人向澳門議事會請願，請求取消包稅。該會詳細調查事情原委後，在5月11日呈報澳督，建議同意華人請求。總督未予答覆。20日，澳門商鋪幾乎全部關門罷市，無從購物，無人工作，船舶也都停航。據稱，如此大罷市為澳門開埠三百年來所未有。官方致電香港購米，僱傭犯人卸船，開倉售予貧窮葡人。21日，罷市持續進行。因察覺商鋪存貨搬走一空，兼聞三合會歹徒大批湧入澳門，官府出動水陸士卒強迫商鋪開市。這一愚蠢的舉措激起民眾更大的騷動。據說當晚三合會將火燒澳門，威脅要取華商巨富的性命。次日，官府被迫退卻，各商鋪才重新開市。促使官府改變態度的是一顯要葡人，他願負責此項包稅，為期六個月，以便得到里斯本的完全許可。28日，前包稅商獲得八千元，放棄包稅權。²³

澳門底層華人生活艱苦，許多人喜歡喝料半酒消遣，尤其是工人階層，每天不吃飯也要花錢買來喝，提振精神，²⁴但澳葡當局為求通過專營承包來提高稅收，竟允許專營商提價，大大增加底層華人的負擔，自然引起不滿。更重要的是，澳門每年大量進口料半酒，同時出口香港，獨家專營後，相關華人商號的生意也會受影響。事實上，此事不僅華人社會上下一致反對，連葡人內部也有意見分歧。然而澳葡當局非但沒有順應民情，更是火上澆油：先是引入香港華商陳耀山來承投，更在明知華人謀劃罷市的情況下，澳督布渣（Custódio Miguel de Borja，1890年10月16日至1894年3月24日在任）竟發佈中文告示，警告“所有澳



圖5. 銅像背面中文銘文（圖片來源：筆者攝製提供）

內各行生意及手藝人等，如無端閉門，顯有抗違地方律例之心，即為倡亂之階，立將該行店生意牌繳銷，並將其人交衙門，從嚴懲辦”。²⁵在此情況下，何連旺、盧九等八十多名華商具名簽署、1,023家商號蓋章，共同發信向澳督陳情，力勸撤回。然而布渣不予理會，甚至禁止華人集會，逼得華人要轉移到灣仔（Lapa）秘密會議。華人後於4月20日起開始罷市、罷工，雖然番攤、閩姓、白鴿票館還開門，但沒有顧客，全城處於癱瘓狀態；而且謠言滿天飛，人心惶惶。然而澳督態度強硬，不肯退讓，更以武力脅逼華人開鋪。4月21日下午，盧九等五十多名華商，連同華政衙門理事官、翻譯以及《澳門人報》（*O Macaense*）東主齊集鏡湖醫院商討局勢。醫院外聚集了大批聞訊趕至的群眾，由於遲遲未有結果，群眾開始鼓譟，院內會議被逼轉入內室。一些商人為平息群眾憤懣，出來安撫，未料群情更為洶湧，高喊取消新稅；進而有人投擲石頭、瓦片，院內

的玻璃窗也被打破，澳葡官員只得從後門倉惶離去。正是在此局勢一發不可收拾之時，非難地出來斡旋，慨然提出由其出資承擔半年承充費，付給澳葡當局，條件是澳督要向里斯本報告情況，取消現時陳耀山的專營權，料半酒不再加價。非難地便是上述拱北關年報所記的“顯要葡人”。澳督在當晚9時俯首退讓，翌日（4月22日）早上華人商鋪乃重開。²⁶此一“澳門開埠三百年來所未有”的華人罷市、罷工行動，在非難地與華商出面協調下，在兩日內化解干戈，消弭了澳葡管治的一場危機，這正是華商祝賀頌詞中所說的“竭力解散，轉危為安”。此事可見非難地的確有豪氣、俠氣，仗義疏財，難怪華商對其感恩戴德。

四、非難地與孫中山

1893年祝賀非難地榮升伯爵的85名紳商，幾乎囊括其時最有頭面的華商，大部分是曾任或後任鏡湖醫院值理的人物，²⁷其他如陳國芬（陳芳）、林含蓮、何連勝等都是著名富商。除澳門本地外，還有香港的李玉衡（李陞）、馮華川、潘榮川、馮子英、蔡炳垣、韋寶珊、何啟，廣東的劉學詢，上海的徐潤，可見非難地交遊之廣闊，亦可見當年中國主要對外通商口岸商人之間的密切社交網。最叫人感到意外的，是孫逸僊（仙）名列其中，²⁸而且在五列名單中排在第四列。這是近年與孫中山有關文物的新發現。說感到意外，係因為據霍啟昌教授考證，孫中山大約是1892年11月才從香港來澳行醫的。²⁹一個初出茅廬的年輕醫生，在澳短短幾個月後就能與眾多頭面人物聯名向非難地致賀，成功進入澳門商紳的社交圈子，有值得深究之處。

孫中山應該是認識非難地的。眾所周知，孫中山有一位澳門土生葡人好友飛南第（Francisco Hermenegildo Fernandes）。³⁰這位飛南第是非難地伯爵弟弟的第二個兒子，³¹因此孫中山通過飛南第認識他的伯父非難地伯爵，就一點也不奇怪。值得思考的是，孫中山為非難地伯爵府中座上賓這件事，與他在澳門行醫的活動有否關連？比如，孫中山並沒有葡萄牙的醫生執照，其能在澳門行醫，是否與飛南第甚至非難地伯爵施加影響有關？³²又比如，孫中山抵澳不久，就在同年（1892年）12月19日由吳節薇做擔保，獲鏡湖醫院借出一筆“巨款”；³³甚或，鏡湖醫院容許孫中山“自籌經費開創西醫局”，³⁴會否都是華商看在非難地家族面子上而作出的呢？此處先大膽假設，須待小心求證。

五、非難地相關文物日期辨析

1. 在《三城記》展覽圖冊中，以葡文列有非難地榮譽的賀幛的製作日期被標為1893年（第117頁），是正確的；但另外三幅包括賀詞及人名的賀幛製作日期卻被標為“十九世紀末”（第115頁）。其實這批絲織品應該是同一群華商特地為祝賀其榮升伯爵而訂製的，製作日期都應該是1893年。這從賀詞中提到的“去歲”料半酒事件可以確定。

2. 非難地獲封爵位的日期，現時有三個版本的記載：一是圖1的賀幛，二是《澳門土生家族》（*Familias Macaenses*），三是筆者從葡萄牙《政府公報》（*Diário do Governo*）查找到的。三個版本日期各有出入，列為表一，原因待考。

表一．非難地獲封爵位日期記述差異

爵位 \ 出處	賀幛	《澳門土生家族》	葡萄牙《政府公報》
男爵	1889-01-31	1889-01-31	1888-10-25
子爵	1890-10-10	1890-04-17	1890-04-19
伯爵	1893-03-18	1893-03-31	1893-03-16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學術筆記

3. 有關非難地銅像的製作年份，筆者見到的葡文材料都記為1871年，³⁵然而只要看過銅像背後的中文銘文，當知此係非難地伯爵死後才鑄造的；從前述1893年11月《叻報》的記述來看，其時華商才開始集資去英國訂造，則此像之落成最快也得至1895年。其實，銅像正面的葡文碑文已將非難地所獲的榮譽一一列出，包括男、子、伯三個爵位，故絕不可能是1871年之物。³⁶

註釋：

1. Senna Fernandes 今通譯塞納·費爾南德斯，澳門又稱“飛氏”，見李長森：《明清時期澳門土生族群的形成、發展與變遷》，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附錄一，頁449。Bernardino de Senna Fernandes 的中譯名字，當年被《澳門憲報》譯為“味摩年叻·非難地”或“味哪年叻·先拿·非難地”；澳門華商的賀幛稱“美那年老·先拿·飛蘭地”，銅像碑則稱“美那年奴·先那·非難地士”。為方便敘述，本文統一以“非難地”稱之。
2. 關於鴉片戰爭後澳門華商的社會地位變化，及其與澳葡當局的关系，參見林廣志：《澳門之魂：晚清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7年，頁319-337。
3. 盧可茵主編：《三城記：明清時期的粵港澳灣區與絲綢外銷》，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2022年。
4. 關於非難地及其妻子的家族淵源詳情，可參閱李長森：〈盧九父子與土生葡人飛南第家族〉，林廣志、呂志鵬主編：《盧九家族與華人社會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民政總署文化康體部，2010年，頁142-163。另見李長森：〈孫中山與澳門土生葡人飛南第〉，李向玉主編：《“辛亥革命與澳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澳門理工學院，2012年，頁248-252。
5. “澳門省營”（Batalhão Provincial de Macau）由澳督亞馬留於1846年10月17日創建，後獲1847年3月12日訓令和同年12月的王室敕令確認批准，參見Silva, Beatriz. *Cronologia da História de Macau*. Vol. 3, Livros do Oriente, 2015, p. 108；湯開建：〈明清時期澳門葡萄牙軍事及警察制度考述〉，《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期（2017），頁11-12。湯文稱該營做“國民營”。土生葡人圈子中傳言，1849年亞馬留遭華人沈志亮等刺殺，係由非難地帶隊去找尋亞馬留首級，見www.macaneseLibrary.org/pub/english/

g0/p26.htm，2023年6月15日讀取。

6. (葡)阿馬羅：〈十九世紀一位土生葡人迄今未發表的日記〉，《文化雜誌》（中文版），第40、41期合刊（2000），頁188-189，註釋15。阿馬羅進一步指出：“可是他的這一措施引起了當地有錢有勢家庭的不滿，因為他們日復一日地看到自己的孩子變成了劣等預備軍人，被人們瞧不起。集中進去的人，並非所有的都能成為正式職員，至於能被選上當個小官的就更是微乎其微；大多數沒有選中的顯然就都感到自尊心受到傷害，感到沒有出路，因為即使沒當上個官或者沒成一個船長或富商，但弄到一份自由職業，就會有社會地位，就有尊嚴。澳門土生葡人一向醉心於繼承他們歐洲先輩們的貴族頭銜，儘管他們的祖先常常只是些冒險家或富商，只不過後來才憑自己的資本換來個城市新貴族的稱號。直到今天都還有些西方旅行家指責土生葡人寧可乞討度日，也不願從事低賤的職業，總愛在華人面前擺闊氣，不願讓他們感到自己貧窮。這種心態和觀念其實早在歐洲中世紀時期就產生了，可能是葡萄牙人將它帶到了澳門。”
7. 參見Veloso e Matos, Eduardo A. *Forças de Segurança de Macau*. VHD, 1999, p. 41；湯開建：〈明清時期澳門葡萄牙軍事及警察制度考述〉，《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期（2017），頁17-18。
8. *Diário do Governo*, n.º 249, 30 de outubro 1888, p. 2403. 非難地祖父名António Vicente Fernandes dos Remédios，父親名Vicente José Fernandes，母親名Ricarda Constantina de Senna，故其爵號Senna Fernandes應是合父母之姓以作紀念，遂以此為姓，其後人包括澳門著名土生作家飛歷奇（Henrique de Senna Fernandes, 1923-2010）。
9. *Diário do Governo*, n.º 87, 19 de abril 1890, p. 837. 據若爾熱·福爾加斯（Jorge Forjaz）的《澳門土生家族》（*Famílias Macaenses*）載，非難地獲封子爵當天，澳門的《澳門人報》（*O Macaense*）稱：“我們不會因此祝賀我們的朋友非難地先生，我們請他不要犯糊塗，花幾百個雷亞爾（Reis，葡萄牙帝制時期貨幣）來擔任他剛從王室獲得的地位。”這似乎暗示非難地的爵位是花錢買來的。見Forjaz, Jorge. *Famílias Macaenses*. Vol. 3, Fundação Oriente,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te, 1996, p. 543, nota 5.
10. *Diário do Governo*, n.º 86, 18 de abril 1893, p. 959.
11. *Boletim do O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íncia de Macau e Timor*, n.º 18, 6 de maio 1893, p. 197. 關於非難地的生平，主要參考：Forjaz, Jorge. *Famílias Macaenses*. Vol. 3, Fundação Oriente,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te, 1996, pp. 543-545；吳志良、湯開建、

- 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四），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2019–2022；nenotavaicontra.wordpress.com/tag/bernardino-de-senna-fernandes/，2023年6月15日讀取。
12. Araújo, Amadeu Gomes de. *Diálogos em bronze: Memórias de Macau*. Livros do Oriente, 2001, pp. 81–82.
 13. 廖澤雲主編：《鏡湖碑林：碑匾集》，澳門：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2011年，頁12–13。“三記行”的葡文名稱即創辦人 Bernardino de Senna Fernandes 的名字，“三記行”是其對應的華文商號名。見 *Directorio de Macau para o anno de 1879*. Tipografia Mercantil, 1879, p. 34.
 14. 趙利峰：《尷尬圖存：澳門博彩業的建立、興起與發展（1847–1911）》，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81–82。
 15. 張廷茂：《晚清澳門番攤賭博專營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1年，附錄1–4，頁224–233。
 16. 盧可茵主編：《三城記：明清時期的粵港澳灣區與絲綢外銷》，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2022年，頁116。
 17. 盧可茵主編：《三城記：明清時期的粵港澳灣區與絲綢外銷》，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2022年，頁114。
 18. 〈擬設銅像〉，《叻報》，1893年11月8日，版5。
 19. 唐李賀〈浩歌〉：“買絲繡作平原君，有酒唯澆趙州土。”
 20. 宋陸游〈六月二十四日夜分，夢范致能、李知幾、尤延之同集江亭，諸公請予賦詩，記江湖之樂，詩成而覺，忘數字而已〉：“吳中近事君知否，團扇家家畫放翁。”
 21. 原碑年月日處為空白。
 22. 據《澳門憲報》資料，陳厚賢等從1886年起成為澳門鴉片煙及煙膏承充商，後生意擴及至路、氹，直至1902年。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1911）》，澳門：澳門基金會，2002年，頁142、165、214、373。
 23. 莫世祥、虞和平、陳奕平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匯編（一八八七—一九四六）》，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年，頁40–41。不過，此處記述的月份有誤，不是5月，應是4月。
 24. 時至今日，澳門勞動工人歇息、吃飯時仍然喜歡“飲番杯”（喝一杯）消遣，不過大多已喝啤酒代替米酒。
 25. *Boletim do O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íncia de Macau e Timor*, Suplemento, n.º 13, 6 de abril 1892, pp. 94–95.
 26. 關於此次料半酒事件，葡文報紙《今日澳門》（*Hoje Macau*）作者何塞·西蒙斯·莫賴斯（José Simões Morais）依據當年葡語報刊《澳門人報》（*O Macaense*）、《獨立報》（*O Independente*）的記述以及《澳門憲報》的官方文件，於2022年7月4日起連續刊載14篇文章作介紹，其大量引用報章原文，詳列葡中雙方觀點及批評意見，梳理出整件事件的來龍去脈。本文此段對事件的簡述便來源於此，詳見 hojemacau.com.mo/autor/jose-sm/，2023年6月15日讀取。14篇文章題目及刊出日期如下：“Vinho de arroz em Macau”（4 Jul 2022）、“Arrematação do vinho Liu pun”（13 Jul）、“O vinho Liu Pun fecha lojas”（19 Jul）、“Greve e lojas fechadas”（25 Jul）、“Liberalização da venda de Liu pun”（2 Ago）、“Liu pun e a versão d’ O Macaense”（8 Ago）、“Greve ou fim do comércio em Macau”（16 Ago）、“Só o Rei pode abolir o exclusivo”（22 Ago）、“Petição dos negociantes chineses”（30 Ago）、“Para terminar com a greve”（6 Set）、“Causas da greve”（13 Set）、“Licenças para o Liu pun”（19 Set）、“Espécies de vinho liu-pun”（27 Set）、“Estudos de Macau – Fábricas de vinho liu-pun”（12 Out）。關於4月21日鏡湖醫院會議華人群眾鼓譟及非難地出面斡旋的內容，見於“Para terminar com a greve”（6 Set）。
 27. 就筆者初步統計，名單中曾任或後任鏡湖醫院值理的有：陳嘉善、盧九、何連旺、鄭鳳亭、何配江、沈靄雲、宋紳、曹渭泉、梁福田、鮑煜堂、李公弼、崔凌雲、張家蔭、盧合、曹善業、吳汝清、林鶴朋、盧應龍、何堯階、林梅修、蕭登、黎若彭、潘如川、覃福田、陳詠南、王歧卿、梁耀僊、楊福初、黃普堂、李裕堂、陳應泉、葉侶珊、李鏡泉（荃）、吳節薇、關蕙田等。鏡湖醫院值理名單見《鏡湖醫院徵信錄（歲次壬戌）》，澳門：鏡湖醫院，1923年，何東圖書館藏本。
 28. 值得注意的是，名單中沒有鄭觀應或其父鄭啟華（鏡湖醫院倡建值事）。
 29. 霍啟昌：《孫中山在澳門：檔案中的孫中山先生澳門經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頁5。
 30. 關於孫中山與飛南第的關係，參見李長森：〈孫中山與澳門土生葡人飛南第〉，李向玉主編：《“辛亥革命與澳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澳門理工學院，2012年，頁248–252；金國平：〈《鏡海叢報》之主筆考——孫中山先生隱瞞與鏡湖醫院華人之衝突試析〉，載李向玉主編：《“辛亥革命與澳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1年，頁231–243；霍啟昌：《孫中山在澳門：檔案中的孫中山先生澳門經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頁49–63。“飛南第”這一中文名是精通粵語和官話的 Francisco Hermenegildo Fernandes 本人所起的，見飛南第1912年致孫中山親筆函，載張磊、盛永華、霍啟昌：《澳門：孫中山的外向門戶和社會舞台》，澳門：澳門大學，1996年，頁206–210。參閱金國平：〈孫中山與澳門二題〉，《澳門研究》，第62期（2011），頁4–5。

學術筆記

31. 飛南第的父親尼閣老·飛南第(Nicolau Tolentino Fernandes, 1823–1898) 是非難地伯爵的親弟弟，在 1851 至 1858 年間曾承充澳門番攤，其後開辦澳門當年最具規模的印刷廠商務印字館(Tipografia Mercantil)，並從 1879 年 2 月開始承印《澳門憲報》(Boletim da Província de Macau e Timor)。飛南第在家中排行第二。
32. 關於此事，可參閱金國平〈《鏡海叢報》之主筆考——孫中山先生隱瞞與鏡湖醫院華人之衝突試析〉，載李向玉主編：《“辛亥革命與澳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1 年，頁 231–243。金文中引述巴斯托律師回憶說：“肯定是因為飛南第的影響力，政府才批准了孫中山醫生在鏡湖醫院中行醫。”見頁 239。
33. 此處日期以 1896 年《鏡湖醫院誌事錄簿》為據。此日期與“巨款”之說，均見黃天：〈考析現存孫中山向澳門鏡湖醫院揭銀借據實為吳節薇之《備忘副本》——兼與譚世寶教授商榷〉，《文化雜誌》(中文版)，第 96 期(2015)，頁 73–102。該文分析孫中山前後向鏡湖醫院借去兩筆款項合共三千一百六十八兩，這金額為當年醫院半年經費。
34. 〈照譯西論〉，《鏡海叢報》，1893 年 12 月 10 日，版 1，參見《鏡海叢報》(影印本)，澳門：澳門基金會、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 年，頁 11。孫中山一到澳門就向鏡湖醫院借錢，會否是與該報提及的“自籌經費開創西醫局”有關？其於 1893 年 4 月 22 日借的第二筆款，才是用於開辦中西藥局的？此處待考。
35. Forjaz, Jorge. *Famílias Macaenses*. Vol. 3, Fundação Oriente,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te, 1996, p. 544; Araújo, Amadeu Gomes de. *Diálogos em bronze: Memórias de Macau*. Livros do Oriente, 2001, p. 81.
36. 該銅像最早置於今得勝花園附近，後移去非難地家族在民國大馬路的大宅，最後被送予澳葡政府，今置於白鴿巢前地東方基金會會址前庭花園內，見 Forjaz, Jorge. *Famílias Macaenses*. Vol. 3, Fundação Oriente,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te, 1996, p. 544.



